

分类号 _____

U D C _____

密 级 _____

编 号 10486 _____

武汉大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梁启超女学思想新探

研 究 生 姓 名 : 王映文

学 号 : 2019201130019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 文碧方 教授

专 业 名 称 : 中国哲学

研 究 方 向 : 近现代中国哲学

二〇二二年五月

**A New Discussion on
Liang Qichao's Thought of Women's Education**

Wang Yingwen

May, 2022

摘要

自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中国就从未停止过对救亡图存之路的探索,直至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一批又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存亡和民族命运的担忧,意识到寄希望于封建腐败的清政府和器物层面的学习均为徒劳,唯有从根本上对国家和国民进行改造和变法,才能实现真正的强国。

作为晚清变法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找到了兴女学以救国这一路径。生于特殊的历史变革时期,他的女学思想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上,甲午战败带来的无力感使当时还在为仕途努力的他毅然走向变法救国之路;经济上,国内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对女工的需求日益凸显其社会价值;文化上,传教士在国内的传教活动和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的所见所得亦引发他对救国思路和改革教育的双重反思;思想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对女性的关注和论述为梁女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历史上的理论参考,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梁启超将其目光投向发展女学。

因此,一方面,梁启超的女学思想作为其救国主张的底层设计,有着自“救国”、“新民”、“开民智”到“兴女学”这一清晰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围绕着女学之兴,梁启超从“生利”、“母教”和“胎教”三个方面论述了女子接受教育对家庭生活、社会劳动力、后代素质及国家发展的积极作用;从呼吁戒缠足和办女子学堂两个主题入手进行了兴女学的实践尝试。同时,通过将梁启超的兴女学与同时期女学思想进行对比,既能够看到梁对他人学说的吸收融合,也能够发现梁女学思想具有理论的系统性和积极的实践性两种特点。

然而,即便梁启超为女学的发展做了诸多努力,在中国女性解放的历史上具有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积极意义,但由于他本人成长于传统儒者的教育模式和接触西学受到思想冲击之间的内在矛盾、女学之兴的尝试和受到封建伦理、父权主宰观念阻挠之间的社会矛盾,因此,梁启超的女学思想在求变和保守之间摇摆,这种摇摆和矛盾则清晰地体现在其女学思想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和将“国母”责任强加于女性、实则给女性套上了另一层封建枷锁的不彻底性。

关键词: 梁启超; 兴女学; 女性解放; 内在矛盾

Abstract

China has never stopped exploring the way to save the country since it was forced to open its doors to Western countries by the Opium War. Changes occurred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China's fiasco in the war made th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who were worried about the fate of the nation realize that they could not count on the corrupt Qing government, nor could they just stop at learning Western technology. Only by transforming the country and its citizens from a fundamental perspective can China truly become prosperous and strong.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form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ang Qichao found a way to save the country by developing women's education. Born in a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of change, his thoughts on women's education are the result of many factors: Politically, the feeling of powerlessness brought about by the defeat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made him resolutely embark on the road of reform and saving the country, who was still working hard for his career; Economically,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modern industry and the demand for female workers increasingly highlight the social value of women; Culturally, the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what Liang Qichao saw and gained during his time in Japan also triggered his double reflection on the idea of saving the country and reforming education; Ideologically, the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on women by thinker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provided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formation of Liang's thoughts on women's studies. These factors together pushed Liang Qichao to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studies.

Therefore, on the one hand, Liang Qichao's thought on women's education, as the basic design of his national salvation proposition, has a clear development context from "save the country", "new citizens", "develop people's wisdom" to "revitalize women's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focusing on the rise of women's education, Liang Qichao discusse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women's education on family life, social labor, the quality of offspring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from three aspects: "creating wealth", "mother education" and "prenatal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two themes of calling for the liberation of women's fee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women's school, a practical attempt to develop women's education is carried out. At the same time, by comparing Liang Qichao with his thoughts on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same period, we can not only see Liang's absorption and integration of other people's theories, but also find that Liang's thoughts on women's studies are both systematic and practical.

However, even though Liang Qichao has made many effor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education and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his theory still has limitations. This i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onfucian education and Western thought, as well as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ractice of advanced thinking and the concept of male dominance in feudal ethics. Therefore, Liang Qichao himself oscillates between seeking change and being conservative. It is clearly reflected in the instrumental nature of its women's education thought to serve politics and the incompleteness of imposing the "mother of the country" responsibility on women, which in fact puts another layer of feudal shackles on women.

Key words: Liang Qichao; developing women's education; women's liberation; internal contradiction

目 录

绪论.....	1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
二、研究方法.....	2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2
四、文献综述.....	3
(一)对梁启超女学思想的讨论	3
(二)对晚清女学的讨论	4
(三)对同时期进步人士女学思想的讨论	5
第一章 梁启超女学思想产生的背景	6
第一节 政治:甲午巨变的冲击催生新的救国出路	6
第二节 经济:经济结构的调整凸显女性社会价值	7
第三节 文化:西学东渐的影响引发国内教育反思	8
第四节 思想:明末清初的女性观点提供理论借鉴	11
一、李贽:对封建伦理秩序的批判重新定义女性定位	11
二、俞正燮、李汝珍:从同情女性命运到肯定女性发展的可能性	13
三、章学诚:划定女子教育的内容导致女学的局限性	13
第二章 梁启超女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6
第一节 “兴女学”的逻辑发展	16
一、欲新国,必先新民.....	16
二、欲新民,必开民智	17
三、开民智,首选女智	18
第二节 “开女智”的理论实现	19
一、由“分利者”到“生利者”	19
二、由“妇学”到“母教”	20
三、由“国母”到“新民”	21
第三节 “开女智”的现实实践	22
一、戒缠足	22
二、办女校	23
第四节 与同时期女学思想的异同	25
一、康有为《大同书》:大同世界中女性的实质解放	25
二、谭嗣同《仁学》:“仁-通”提供男女平等的理论支持	27
三、严复《论沪上创兴女学》:言行不一的女学观	28
四、康同薇《女学利弊说》:女性主体视角下的自我觉醒	29

五、小结.....	30
第三章 梁启超女学思想的评价	32
第一节 积极性.....	32
一、理论层面.....	32
二、实践层面.....	33
第二节 局限性.....	33
一、局限性的表现:“兴女学”之工具性与不彻底性.....	33
二、局限性的原因:求变愿景与保守现实之间的矛盾	35
结语.....	40
参考文献.....	41

绪论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中国女性在过去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生活中曾深受歧视与压迫，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对中国传统观念所产生的强烈冲击，一批又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展开了对挽救民族危机、探索有效救国出路的积极尝试，也正是通过这些勇敢的尝试，他们发现中国积贫积弱的根节就在于制度的落后和国人的愚昧，意识到西方强盛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拥有领先的技术和优秀的人才，而这两者都需要靠完备且先进的新式教育作为支撑，于是寄希望于通过改革教育去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尤其是影响着家庭氛围、乃至国力与民族气质的女子教育。于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纷纷开始著书立说，阐述对于关注女性生存现状、发展女子教育的深刻思考。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作为一个成长于历史交织过程中的人物，他的思想既具备前人少有体现的包容性，但同时也充斥着不可避免的冲突性，而这些特点在梁启超对其女学思想的论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梁启超自幼接受的是传统儒者的正统教育，在他最迫切汲取知识养分的年纪接触到了对他思想颇具冲击的西方文化，因此他关注女性和女子教育的视角既立足于本国现状，也汲取了西方女性观念中的先进成分，是中西文化结合下的思想产物。另一方面，虽同处于国家危难之际，但与梁同时期的其他进步人士对女学的关注较少，他们的文章或通过观察中国女性苦难的生存处境描写现象，或试图从制度上批判腐朽落后的纲常伦理却止步于喊出男女平等的口号，这些文章的确从不同维度对女性话题的某一方面展开了论述，但较梁启超而言，不尽完善。梁启超大力提倡的“兴女学”不单局限于关注女子教育这一项，而是一套贯穿在他政治思想中、综合了理论与实践、有着双重价值的学说。理论层面，梁启超在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先后发表《戒缠足会叙》、《论女学》、《倡设女学堂启》等文章，借用舆论工具宣传女性应接受教育的观点；实践层面，他联合维新人士创立“不缠足会”、筹备女学堂，用实际行动支持着女性在社会生活层面的自我解放。因此，不论是从晚清的背景来看，还是从当下视角去回顾这段历史，梁启超的女学思想都极具开创性。

作为中国近代妇女解放史和政治哲学史中都不能略过的一笔，研究梁启超的女学思想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其一，国内专门研究梁启超女学思想的著作和文章较少，因此，试图从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同期思想家学说的对比等角度去阐明梁女学思想的独特性、矛盾性与不可替代的价值，不仅为近代女学的研究增添新的理论成果，也有助于更全面的理解梁启超政治哲学的框架及女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其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思想的交融，现代女性的生存环境基于相

应制度的逐渐完善和舆论的推动,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但现实中由性别歧视引发的一系列恶意却仍然真实存在且使她们饱受困扰,这些现实情况所折射出的实质问题还是女性解放与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之间的矛盾,若想彻底冲破因性别差异带来的各种桎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妇女解放历史中的先驱人物,在当今时代的语境下重新讨论他先进的女学思想不仅是在以史为鉴,反思现代女性追求解放可能存在的问题与局限性,也为探索现代女性发展之路提供了有效启示与新的思路。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首先,《梁启超全集》是研究梁十分完整且全面的材料,本文以其中涉及女学思想的一手文本为基础,结合《梁启超年谱》等二手资料对梁启超女学思想的内涵进行系统梳理。其次,结合梁同时期进步人士所著的文章,分析梁启超女学思想在当时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的原因,并结合当下时代语境为现代女学的发展方向提供启示。最后,本文提取有关梁政治学说的论述,探讨女学在梁启超救亡图存的政治框架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加深对其女学思想理解。

2.比较研究法。本文横向结合与梁启超同时代的进步人士对女性问题的论述,探讨梁启超女学之所以具有代表性、引起社会轰动的原因,纵向从中西文化交流、古今时代背景等角度考察梁启超女学思想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的因素。

3.历史研究法。本文将结合梁启超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去探讨其女学思想形成的原因、内涵、时代必然性及其内在矛盾性。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1.重点:通过系统梳理梁启超女学思想的形成背景与具体内容,结合其救亡图存的政治学说,阐明女学思想在梁启超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通过对梁启超同时代思想家的女学思想进行分析,探讨梁启超女学思想在其中的独特性。

2.难点:首先,梁启超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思想涵盖了政治、历史、哲学等诸多领域,从而需要从他庞杂的作品中准确地择取出可能与女学思想相关的论述。其次,也正因为梁启超思想涉猎范围之广,仅仅考察直接与其女学思想相关的文本远远不够,还需要从二手材料以及同时期其他人的文章中提炼出对梁启超女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的文本作为补充,以加深理解。因此对本人研读文献的量和细致程度、把握材料的准确性、梳理思想脉络的要求较高。

3.创新点:其一,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研究数量较多、维度较广,对其女学的专门研究和著作却少之又少,它或是出现在研究梁启超专著的某个章节中、仅

作为其学说框架中的一个逻辑环节被提及,或是在有关教育史的著作中由于晚清时代背景的重要性而被列入讨论,亦或是在不同的论文中被拆解成细小板块进行研讨,因此学术界对梁启超女学思想的研究存在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缺漏。其二,为填补对梁女学研究的空缺,本文不仅在直接研究梁启超文本的基础上梳理其女学思想,也对同时期代表人士的学说专列章节,用横向比较的手法,既分析梁女学与其他人思想的异同,也阐明在晚清众多学说中梁启超女学独树一帜且轰动一时的原因,这对理解梁启超的女学思想、对摸清整个晚清背景下的女性解放实况、对疏通梁启超的政治学说脉络,都具有丰富的启迪价值。其三,在评价方面,梁启超的女学思想在其出现的时期确实影响巨大,具有开创性意义,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女学思想仍存在诸多局限性,尤其是梁启超本人思想体系存在的内部矛盾,以及其进步思想直面封建伦理时所体现出的社会矛盾,讨论此对探索现代新女学、从女学角度思考中国道德生活尤其是女子现实生活的出路都有着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启示。

四、文献综述

(一) 对梁启超女学思想的讨论

就专著而言,由于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学术界对梁启超各领域思想的研究都有着非常丰富的成果,但针对梁启超女学思想的研究专著却是少之较少,现有讨论也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分散于研究中国女子教育史的著作中、只是作为晚清女学发展的代表观点之一和历史的组成部分被作以简要介绍。如郭松义在《中国妇女通史》清代卷中由反缠足和创办女子学校这两个具体实践肯定了梁启超为女性解放所做的尝试,并指出这些举措不仅在精神上是一种激励,也是中国女性真正开始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家庭走向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却并未对梁女学的形成作具体分析。雷良波的《中国女子教育史》倒是专列小节较为细致地介绍了梁启超重视女子教育的原因和意义,同时从未能动摇封建统治和阶级压迫的视角指出梁启超试图用西学探索中国女性解放之路的局限,但没能分析这种局限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二,只是在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专著中作为一个角度被小篇幅提及,如宋仁在《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一书中提到了女子教育的部分,从做法和意义两方面讨论了梁女子教育思想的内容,并指出其中的积极因素对发展现代妇女教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然而他未能结合具体的时代内涵对梁启超女学的形成过程与变化进行更深入的梳理和分析。

可见,尽管梁启超的观点作为研究女学思想不容略过的一笔,但相关专著却实有空缺,即便在已有的讨论中,也只是作为一段史实被介绍,不论对其成因还

是发展脉络，包括其历史局限性存在的根本原因，均未作系统讨论。

相较于专著，讨论梁启超女学思想的文章倒稍显丰富，讨论维度也众多。但不论是学位论文，还是其他文章，也存在着如下两方面的遗憾。

其一，4篇学位论文中均存在未尽之处。陕西师范大学史莉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梁启超女学思想研究》（2007年）中论述了近代女学的兴起，将梁启超的女学思想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讨论并肯定其积极意义，却忽视了时代特征对梁女学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且未能站在女性真实解放的角度察觉出梁启超女学的局限性。同样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邵引娣和山西师范大学的李莹莹倒是分别在硕士论文《梁启超女性教育思想研究》（2008年）和《维新时期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成因、表现及特点》（2013年）中关注到了梁女学具有封建保守的局限性，却未对造成该局限性的实质原因加以更深入的探讨，同时，对于梁启超女学思想在整个晚清女学思想中体现出的独特性与重要性也没有进行过多的诠释。2009年，东北大学研究日语语言文学的高玉娟在用日语写作的硕士论文《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及其日本因素》中通过对梁启超流亡日本前后的女子教育思想的对比分析指出了该变化中蕴含的日本要素，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研究素材，但从梁女学思想的宏观角度而言，梁本人在日本期间的所获并非其女学思想的主要成因。

其二，还有一些文章通过比较单一的视角对梁启超女学思想进行了讨论，如史莉琴在《梁启超的戒缠足思想与实践》一文中从缠足的实践出发，将戒缠足和兴女学联系起来，认为缠足不利于女子接受教育；谈儒强《论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价值意蕴》一文主要从女子接受教育的意义出发分析了梁启超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分量，但也缺乏对其他人教育思想的介绍，从而未能凸显梁的特殊之处。也有一些文章将梁启超与其他思想家代表性的女学观点进行对比，如《严复与梁启超的妇女解放思想比较研究》、《梁启超和孙中山妇女解放思想和实践的比较研究》等，从而突出梁启超女学思想的特点，但由于梁女学思想形成于复杂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之下，需要选择更多同时期的女学观点加以对比才能更加系统和全面的发现梁女学的独特性。

由此可见，对梁启超女学思想的学术专著有所欠缺，已有作品中的讨论篇幅也较为短小，而学术论文的讨论角度虽更为多元却难免有些零散、不成体系。因此，针对这些缺漏之处，本文将重点关注梁女学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具体成因，分析时代特征对其发挥作用的因素，并更为系统地梳理梁女学的发展逻辑，分析存在于其局限性背后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二）对晚清女学的讨论

晚清女学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国内学者若想研究近代妇女解放的历史，必然无

法避开这一时期，只有明确了晚清女学的发展脉络，才能对梁启超女学思想的地位进行更加准确的定位，而对梁女学的研究也能使晚清女学的呈现更为清晰具体。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陈东原著《中国妇女生活史》认为晚清女学的兴起是中国妇女生活状态发生改变的重要转折点。夏晓红也认为在晚清的社会震荡中，女性的生存状况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她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上篇第一章便对晚清时期中西合璧的女子教育思想展开讨论，试图以女性问题作为透视整个晚清社会的窗口。程谔凡《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一书认为晚清维新变法时期的女学作为萌芽期的产物，对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和韦钰的《中国妇女教育》等专著、王金婷《戊戌维新时期“兴女学”思潮及其传播研究》等文章，也在梳理历史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晚清女学的重要性作以阐述并肯定其对于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发展的意义。除此，对于晚清女学的历史局限性，梁丽英在硕士学位论文《晚清女学研究》中指出晚清女学虽发展不均，却改变了中国只有传教士办女校的状况，掀起了兴办女子学校的热潮，为民国时期女子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李平在《晚清女学兴起及内在矛盾性》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清女学的兴起一开始就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作为维新派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

可见，学术界对晚清女学价值的讨论成果较多，但对于局限性及成因的讨论较少、亦不够深入，本文将重点结合晚清的时代背景梳理梁女学的产生过程、分析其女学局限性的成因，这对于明晰晚清女学的历史定位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对同时期进步人士女学思想的讨论

晚清女学的地位如此重要，不仅是时代使然，也得益于一大批先进人士为救亡图存所付出的不懈努力，晚清的进步分子如此众多，目前对女性教育展开了集中讨论的却主要集中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经元善、康同薇六人，曹娟《谭嗣同仁学体系中的妇女解放思想研究》和李砂砂《严复教育思想述论》、李永生《经元善的中国新式女子教育探索》、余丽芬《康同薇女子教育思想述评》等成果就针对个人的教育思想进行了一系列论述，却鲜有将这些女学观点进行直接对比的成果。而同为一个时代的人物，同为挽救民族危机而纷纷著书立说，这批思想家研究女子教育、女性解放的基本差异在何处，梁启超的女学思想为何偏偏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且影响如此深远，这些问题在以上成果中也没能通过比较的手法予以完整呈现，却也为讨论梁启超女学思想的地位提供了新的思路。

因此，本文还将聚焦于对比梁启超与同时期的女学观点，试图以横向视角发掘梁女学在历史定位中的独特意义，以丰富晚清女学的研究成果。

第一章 梁启超女学思想产生的背景

梁启超女学思想的出现可以说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前人思想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一方面，战争的失败和国家主权的接连沦陷一次又一次刺痛着这位爱国青年的心，让他对统治阶层彻底失去幻想，于是他开始寻找一条有效的救国之路；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和先进思想的冲击下，对国人之愚昧闭塞深感无奈的梁启超仿佛看到了照亮救国之路的曙光，于是他强调“开民智”对促进国民觉醒的作用，宣扬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对于国家走向兴盛的重要性，这与梁启超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第一节 政治：甲午巨变的冲击催生新的救国出路

自封闭的国门被鸦片战争一炮轰开，中国已经见识到自己与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于是以洋务派为首的进步分子以“自强求富”为旗号，进行了洋务运动等一系列积极尝试，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工业等方法以增强国家军事和国防实力，维护清朝统治。然而，由于传统封建制度已根深蒂固的种种弊端和守旧派的阻挠，这场轰轰烈烈的自救运动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结局下，宣告破产。

1895 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二人正在北京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同年中日甲午战争自 1894 年 7 月起至此已经打了半年之久。当清政府在战争中惨败和《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举国上下已是人心惶惶，康梁二人得知后更是愤慨万千，当即邀请各省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准备联合上书光绪帝，反对与日本议和，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关于首次上书的情况，梁启超后来在《三十自述》中描述道：“明年乙未，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¹然而，由于时局的紧迫和朝政的纷乱，第一封请愿书在当时并未如康梁所愿被转奏给光绪帝，他们决定再次召集在京举人，进行第二次上书。于是，在各省举人的讨论下，康有为连续两天奋笔疾书，写成长达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由梁启超、麦孟华等人连日缮写一千余份，遍传京城，士气愤涌，震撼朝野。²这份请愿书也被称为“上清帝第二书”。在这封请愿书中，康有为提出“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³，第三次上书又提到“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⁴对于割地议和痛心疾首的他深刻意识到变法对于立国自强的必要性，而针对变法的具体方案，他

¹ 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 23 页。

² 马勇：《晚清二十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70 页。

³ 吴天任：《康有为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 109 页。

⁴ 吴天任：《康有为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 114 页。

强调了教育的作用：“所谓‘成天下之治’者，以上述三策，乃权宜之计，而长治久安，必须变法，提出富国，养民教民之三策。”¹可见，当时的康梁等人不仅对于清政府面对议和时可实行的政策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都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思考，而且对于一些具体的方案也作了详尽的论述，譬如请愿书中提到的教育方针，这说明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很早就看到了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早在 1893 年，梁启超就曾说过：“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己守残数百年，若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²如果不接受教育，国人的封闭与愚昧一日不改变，国家贫弱的局面也无法从根本上有任何改变，国家的强大终究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

然而，尽管他们作了如此多的努力，也没能阻止无路可退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受尽屈辱，这深深刺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但是从其影响而言，一方面，甲午战争巨变带来的冲击使一批知识分子彻底清醒³，他们意识到过去拼尽全力所追求的苦读圣贤书和仕途在国家兴亡面前，不过如同泡影一般，更迫切的事情是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另一方面，对于梁启超而言，如果说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前的他对于科举和功名利禄还有所追求，那么“公车上书”的失败和无力使他看清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与国人的封闭愚昧，有学者所说，梁启超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特殊环境下的特有现象。换言之，如果不发生近代中国那一系列急剧性的政治变化，准确地说，如果不是出现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当然如果不是中国惨败，那么不论梁启超天生具有怎样的反叛精神，他最终都不能逃脱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般成长道路，即通过科举踏入仕途⁴。也正是基于此，梁启超开始了将伴随其一生地对救亡图存之路的探索，在这期间，他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甲午受创，渐知兴学。”⁵可见，对甲午一败的思考为梁启超日后女学思想的形成早已埋下了伏笔。

第二节 经济：经济结构的调整凸显女性社会价值

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且广泛的，其中，经济领域的表现十分显著。西方列强的入侵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逐步瓦解，而伴随着一系列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之匹配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在发生着改变，其中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尤为明显。

经济调整对女性生活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鸦片战争

¹ 吴天任：《康有为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 110 页。

² 梁启超：《梁启超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版，第 686 页。

³ “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钜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70 页。

⁴ 马勇：《“流质善变”：梁启超思想之本质》，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01）：5-14。

⁵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04 页。

以后,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中国进步分子开展了自救运动,为壮大军事实力,其中一大重要举措就是兴办工厂,于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近代工厂的数量迅速扩张,这对于过去以家庭纺织业为生的女性造成了直接冲击,因为与传统的家庭作坊相比,工厂的效率更高、规模和产量也更大,而当市场逐渐被效率更高的工厂所占据,广大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女性便没有了生存的出路。同时,正是由于工厂数量的剧增,工厂对于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扩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指出,机器的使用使得原来需要依靠男子力量的活动被水力和蒸汽力所取代,然而,虽然拥有机器和技术,由于女性劳动力的低廉价格和更为精巧的技术,她们在近代工厂中更受欢迎。尤其在众多纺织业工厂、如缫丝厂中,女性由于拥有丰富的纺织经验、更为精湛的技术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相比男性而言,她们显然更为抢手。

经济结构对女性工人的影响还体现在敢于参与阶级斗争层面。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书中,汪敬虞统计了自1895年往后18年的时间里,在上海共有70次罢工,以丝厂、纱厂等女工为主的罢工就占到了39次。不难看出女工斗争在整个工人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¹虽说由于社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女性的社会价值得以凸显,然而在传统腐朽观念的影响之下,较之男性工人,女性工人的地位并不高,甚至仍然饱受压迫,但她们既然已经从家庭走向了社会,就意味着女性在为争取自身解放的进程中更进了一步。

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要求下,一方面,工厂对于女性劳动力的要求充分扩展了女性进行社会交往的范围和了解社会的空间,她们不再被禁锢于家庭之中,更无需只能依赖男子而活。另一方面,女性随着社会价值的凸显,在面对歧视与压迫时,她们敢于为自身利益和解放而摇旗呐喊,这在中国妇女史中可谓是一巨大的进步,自然也为梁启超女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支撑。

第三节 文化：西学东渐的影响引发国内教育反思

在文化层面,对梁启超影响较大的外来思想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西方传教士国内的入场,其二是他基于流亡日本所见所闻的反思。

西方传教活动真正被允许进入中国要追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58年,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强迫清政府在天津分别签订不平等条约,合称《天津条约》,其中,《中英天津条约》明确写道:“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知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这为日后传教士进入中国及西方思想的涌入奠定了前提。

那么,传教士进入中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一方面,传教士对宗教教义和西

¹ 马庚存:《论中国近代产业女工的历史命运》,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04):65-67+73。

方文化的宣扬冲击着中国传统观念。类似“众生平等”、“天赋人权”、女权等西方观点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传统等级观念来说是一种颠覆。对于梁启超而言,他曾于光绪二十一、二年间担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秘书,深受李氏器重,李氏在在翻译西方历史书籍时也会让梁启超在一旁帮忙,因此,这两年的秘书经历让梁启超对西方文化耳濡目染,一定程度上也了解到了若干西方的政治历史见闻。¹另一方面,对于把中国视为殖民地的西方列强来说,显然,他们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宗教和文化的输入影响和同化中国人的思想,从而实现对对中国更为彻底的控制。

然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并非一帆风顺,基于中国闭关锁国的影响和中国底层群众的愚昧与麻痹,西方对中国进行文化入侵的进程面临着重重阻力。于是,为了更加顺利地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正如梁启超对当时情境的描述:“泰西女学,骈闳都鄙,业医课蒙,专于女师。虽在绝域之俗,邈若先王之遗,女学之功,盛于时矣。彼士来游,悯吾窘溺,倡建义学,求我童蒙,教会所至,女塾接轨。夫他人方拯我之窘溺,而吾人乃自加其桎压。譬犹有子弗鞠,乃仰哺于邻室,有田弗芸,乃假手于比耦,匪惟先民之恫,抑亦中国之羞也!”²可见,为了发展女子教育,传教士们针对适龄女性创办教会学校,为女子接受教育提供场所;而为了扩大教会女校的影响,他们借用舆论的力量在报刊上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进行了批评。总之,为了开展女子教育,也为了通过教育影响中国人的思想,从而更加顺利地进行传教活动,西方的传教士们做了许多努力,梁启超等一众进步知识分子也看在眼里。

除在华传教士对国内女学发展直接进行的实践探索外,邻国日本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梁启超对西学的认识。这种影响首先来源于梁启超对日本成功经验的反思。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进行明治维新,进行全面西化和现代化改革,在女子教育方面,日本也进行了诸多尝试。早在1872年,日本就颁布《学制》,并规定女子和男子一样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就为日本女性接受教育一事提供了制度和法律层面的保障。基于这样的背景,当处于同时代的中国这大大提高了全社会女子的素质,当然,也促进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对于其成果,梁启超认为:

“日本之步武泰西之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俄远而治效不着,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³

可见,一方面,梁启超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是高度认可的,另一方面,作为地理位置离中国最近、且文字和文化都有着相似之处的邻国,日本也是中国学习的最佳对象。

¹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版,第27页。

²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³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其次,日本的发展对梁启超的影响还体现在了他对西学的认识得以加深。在流亡日本之前,梁启超说:“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本等本源之学,几无一书焉。”¹也就是说梁启超在国内对于西学的了解并不完整,且缺乏涉及西学思想之本原书籍的资料,这种情况在梁启超去日本之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²一方面,他在日本可以直接接触到西学书籍,通过搜集和阅读大量书籍,梁启超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更为广泛和系统的认识,另一方面,梁启超已经能够自主阅读日本报纸,说明他还为了阅读的流畅性、真正吸收西方思想,专门深入学习了日语,足以见得他当时对于了解西方思想的极度渴望。

那么,在日期间接触的种种西学思想与进步学说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是如何呈现的呢?这体现在梁启超救国思路的转变上,即从“图存”最终落到“自新”。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老师康有为的救国口号是“保国、保种、保教”,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梁启超写道“然则欲国家之独立,不可不谋增进国民之识力,欲增进国民识力,不可不谋转变国民之思想,而欲转变国民之思想,不可不于其所习惯所信仰者,为之除其旧而布其新,此天下之公言也。”³这其中的“信仰”就是尊孔,康梁想通过尊孔这一中国已延续千年的权威性传统思想来教化民众,以形成一个思想一致的社会群体、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变法。而面对改变国家处于危难的局面,为了图存保国,康梁甚至不惜冒险,试图“借友邦之力以谋于上也”,可见,梁启超最初的救国思路只是为了在面对西方国家的侵略时,能够暂时使国家免于毁灭性结局,但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接触到了日本进步情况和更深入的西学思想之后,他也意识到一味图存并非长久之计。

1902年2月,也就是梁启超到日本的第五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反对之前保教的学说,其中主要原因是“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论之最大目的也。”⁴梁启超在日期间的收获在这篇文章中也得到了融合,他看到了西方强盛的根源之一,充分吸收西方文明中的法律与自由精神,认为“彼持保教论者,自谓所见加流俗人一等,而不知与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适相刺谬也,今此论固不过一空言耳。”⁵也看到了自由精神对国家发展的推动作用:“欧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世纪时,古学复兴,脱教会之樊篱,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进

¹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²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7页。

³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⁴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65页。

⁵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65页。

步乃沛乎莫之能御，此稍治史学者所能知矣。”¹因此，这个时候梁启超意识到，要想救国，一方面，必须抛却传统思想中禁锢了国人的部分，另一方面，任何外力都是不能依靠的，只能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以实现自强。

关于如何自强，梁启超在写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提到：“弟子意欲以挾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即如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然使二十年前而昌之，则民智终不可得开而已。”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现状，需造出新思想，这个新思想在梁启超后来写成的《新民说》中被完整诠释，也为梁启超关注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

总之，如果说西方传教士的入场直接带来女子学校的办学实践，那么流亡日本期间的收获让梁启超在救国主张方面实现了重大转变，他开始宣传“新民”思想，并试图通过教育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这两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中国封建社会历来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女子普遍被“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主，不得任公事……不得出室门”。²更不会幻想拥有同男子一般接受教育的权利，而西方和日本的举动不仅冲击着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和伦理观念，更深深刺激着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心，当然，也为梁启超“兴女学”的思想提供了思想和现实的双重支持。

第四节 思想：明末清初的女性观点提供理论借鉴

清代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继续走向了衰落，统治者出于其集权专制统治的需要，大力褒奖寡妇守节，对守节者赐以祠祀和树牌坊，将女子的操行贞节教育制度化、社会化，酿成一幕又一幕妇女生活的悲剧。广大妇女在政权、族权、夫权和神权“四大权力”的重压之下，挣扎着，过着屈辱的生活。³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和社会风气下，女子教育的内容是教会她们如何恪守妇德，成为统治者希望她们成为的那类女性，这显然是一种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精神压迫。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仍然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他们勇敢站出来反对封建、反对社会中既定、却不合理的束缚，其中就不乏对女性及其教育的关注，这也为梁启超提出兴女学思想提供了理论参考。

一、李贽：对封建伦理秩序的批判重新定义女性定位

李贽（1527-1602）是明代的进步思想家，他的女子观来源于对封建伦理的批判。首先，他揭示了旧道学的虚伪性。在《焚书·唐贵梅》一篇中，他记录了烈妇

¹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65页。

²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十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36页。

³ 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

唐贵梅的悲惨故事。为忠于因贫弱去世的丈夫，唐贵梅没有向想将自己献给富商的老姑低头，甚至当老姑以不孝之罪名将她告至官府的时候，她为了顾全老姑，也没有选择对官府说出实情，最后饱受刑罚，痛苦死去。按照当时社会所推崇的女子形象，唐贵梅可谓是“孝烈”之典范了，然而最后还是落得一个凄惨的结局，因而李贽感叹道：“今通判贪贿而死逼孝烈以淫，素读书而沐教化者如此，孝烈唐贵梅宁死而不受辱，未曾读书而沐圣教者如彼：则先王之教化亦徒矣。”¹也就是说，本该为百姓谋福的官员因受贿滥用刑法，本守节尽孝的女子无辜死去，如此一来，那些读过“圣教”的道学家们对于此作何解释呢？所谓的先王之教化又有什么用呢？这件事不仅让李贽对于虚伪的道学展开了猛烈批判，也让他对以唐贵梅为代表的中国女性产生了深深地同情。

其次，李贽打破封建伦理秩序，将“夫妇”立为五伦之首，他说：“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夫妇之为物始也如此。”²此言一出，可谓是对传统儒家人伦关系和秩序的又一次猛烈冲击，但也正是在李贽对重视“夫妇”、家庭观念的过程中，女性的地位在无形中被他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夫妇”应为第一伦的理由，李贽也在文中解释说：“夫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初无所谓一与理也，而何太极之有。”单从物质层面而言，生命之初始，只有阴阳二气，男女两性，并没有所谓的“一”和“理”，一方面，男女和夫妇是所有关系的开端和伊始，应该处于五伦之首，女性作为与“夫”对应的“妇”也出现在了五伦之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女性在人伦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男女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是阴还是阳，其本质上是平等的，并没有地位的高低和优劣之分。

最后，当女性地位在李贽心中有了全新的定义后，他对女子接受教育也表示了肯定的态度。在编写《初谭集·夫妇》时，他从《世说新语》和《类林》中搜集了不少有才识、善言语、有文采的妇女故事，并对这些才女加以赞扬，在李贽看来，那些有才识的女子同男子一样值得被尊敬。³在此基础上，他说：“谓人有男女即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⁴意即男女虽有性别之分，但见识和学识却没有性别之分，这体现了李贽对女性身份的认同与尊重。

总之，不论是对虚伪道学家的无情嘲讽，对不合理的封建传统伦理的批判，还是对女性地位的重新定义，李贽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疑是对一次传统思想的束缚发起挑战的勇敢之举。

¹ 李竞艳注说，李贽：《焚书：续焚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516页。

² 李竞艳注说，李贽：《焚书：续焚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309页。

³ 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⁴ 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二、俞正燮、李汝珍：从同情女性命运到肯定女性发展的可能性

在清朝崇奉正统儒学、压抑异端学者、全力展开思想钳制、强化宗法制、并将伦理道德飓风全力向女子袭来并极力摧残到极度之时，竟也出现了几个同情女性的人。¹俞正燮（1775-1840）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他在许多篇目中都曾为饱受压迫的中国女性打抱不平，在其《癸巳类稿》、《癸巳存稿》中用近6万字的篇幅，运用传统的考证法，大力批判封建礼教对人性和对女性身体的摧残，试图帮女性发声，这既充分体现了他对于女性的同情，也蕴含着男女平等思想的迹象。总之，俞正燮的女学观在当时已经十分具有超越意义，并对往后的妇女观产生深刻影响。²

从男女平等的角度而言，一方面，俞正燮从女性生来就与男性不平等这一观点出发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女性天生命运为悲惨的事实。他说：“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而女子“不为家所珍。”另一方面，在婚姻生活中，男女也是不平等的，男性在选择配偶上占据特权，但对于女子来说，“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³总之，在封建传统礼教下，女性不仅生来就注定了与男子不平等的命运，此后，这种不平等也将伴随着女性的一生，且无法改变。对此，俞正燮表达了他的同情。

另一代表人物李汝珍（1763-1830）的女子观主要集中在其代表作《镜花缘》中。如果说俞正燮对于女性的关注表达在对女性凄惨命运的同情，那么李汝珍更进一步，看到了女子实现自我发展的可能性。胡适曾指出《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换句话说，《镜花缘》小说的一个主旨就是在讨论妇女问题。

一方面，李汝珍笔下的百位花神降生人世后，都是一些才女义士，这与过去小说中情意缠绵、弱不禁风的佳人面貌大不相同，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刻画就直接体现了李汝珍对于女性性格和才能的认可。另一方面，李汝珍也确实称赞了女子在接受教育后能够达到的学识水平，如第七回《小才女月下论文科·老书生梦中闻善果》中：“唐敖道：‘舅兄可知近来女子读书，如果精通，比男子登科发甲还妙哩！’”⁴作为男性，李汝珍能够站在男性视角去说明女性接受教育后可以超越男性的可能性，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大胆的观点，但鲜明表达了他本人对于女子接受教育的肯定。

三、章学诚：划定女子教育的内容导致女学的局限性

诚然，李贽、俞正燮和李汝珍是帮助女性发声的代表，但是也存在这样一些

¹ 雷良波,陈阳风,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

² 徐适端:《俞正燮的人权意识及其妇女观评述》,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6):140。

³ 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⁴ 李汝珍:《镜花缘》,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27页。

知识分子，他们认为男尊女卑等名教纲常是不可违背的，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男女平等的可能性，其次，对于女性教育，他们并没有否定女性接受教育、即妇学的存在，但是对女性教育的内容进行了严格的限定，认为女性所学不过是“妇学之目，德言容功。”¹

清初，受学术兴盛的影响，社会上涌现出不少女性诗人，当时有一个叫袁枚的人，因广收女徒弟而深受世人拥戴，这使章学诚（1738-1831）大为震怒，在他看来：“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一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²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他专作《妇学》，将他女子教育的看法进行了专门的论述，章学诚这篇《妇学》，其中心意思无非是说：妇言、妇德、妇容、妇功，才是妇人的“正学”，而写诗作文，对良家妇女来说，“内言且不可闻闻外，唱酬此言，何为而至耶？”可见，在章学诚看来，他是肯定女性接受一些教育的，但是对于教育的内容，他也规定得很清楚：“妇人本自学，学必以礼为本。”这说明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章学诚仍然深受封建礼教的局限，把女性“四德”作为正统的教育，他对于教育内容的限制实际上还是将女性禁锢在了封建的伦理秩序之中，而没有将女人和男人一样视作一个完整意义上、可发展的人和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去看待，这种观念下的女学，实则还是局限的。

综合这些人物的观点，不难发现，他们其实都清楚地看到了封建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压迫与悲惨的命运，然而，他们面对这一事实的态度是不同的。

就积极方面而言，其一，他们透过女性悲惨的现实境遇对女性产生同了情，从而呼吁男女平等，认识到男子和女子同样作为人，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这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无疑已经是一次思想上的飞跃。其二，这些思想家并没有反对女子接受教育。男女平等意味着女子应该与男子享有同样的权利，当然也包含了接受教育的权利，这就为女性通过教育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甚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提供了可能性。

就局限性方面来看，这些思想家的观点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落后之处。其一，尽管这些思想家都在各自的代表作中表达了对女性的关注，然而却鲜有人真正付诸于实践，而是停留在理论和文字呼吁层面。其二，虽然没有明确反对女子接受教育，但是通过对女子教育内容进行限定这一事实，反映出他们并没有摆脱传统封建礼教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些思想家一边支持男女应该平等、女子需要接受教育、女子同样可以通过教育实现自我发展等观点，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规定了女子学习的内容必须符合三纲五常和妇德，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发展仍然未能摆脱封建伦理纲常的约束，只是被刻画成男性希望女性成为的样子，显然，这不

¹ 章学诚、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² 章学诚、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296页。

是一种真正的解放。而这些历史上的局限性在梁启超的女学思想中得到了改善。

第二章 梁启超女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通过探讨梁女学产生的背景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梁启超的女学思想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前人思想综合后的产物,因此他的思想中既体现着独有的时代特征,也汲取了诸多先进思想中的进步成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带有如此鲜明的时代烙印,在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中,救亡图存始终是主线,因此,围绕着这一主线,梁启超展开了对救国和强国之路的探索,“兴女学”则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节 “兴女学”的逻辑发展

一、欲新国,必先新民

1902至1906年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汇编成《新民说》一书,该书将“新民”作为中国救亡图存的第一要务,旨在通过唤醒国人的主权意识和自觉,去除国人的愚昧和奴性,成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并阐述了一系列现代国民所应有的条件和准则。

为什么把“新民”作为救国的第一要务呢?梁启超在书中第三节中解释道:

“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¹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之所以独立,在于国民的特质,一个民族之所以底蕴深厚,则在于民族文化的传承,而肩负着传承任务的载体仍然是一国之民,中国也不例外:“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²过去的中国一直以来屹立于东亚大陆,周围都是落后的小国家,由于闭关锁国和盲目自大,没有和别的大国进行较为友好及亲切的交流,而是始终以一种高傲的姿态在对待其他国家,但鸦片战争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大炮直接轰开了中国紧锁的大门,让中国见识到了其他国家的强大,这种强大一方面是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民之间存在的差距对于国家实力的巨大影响,在中国人还在小农经济下自耕自足时,西方人已经运作了大量工厂,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蓄力。因此,梁启超通过分析人种和其他民族强盛的原因与历史,得出结论:“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³

那么,在明确了国民对于国力的影响力之后,为什么要对民加以“新”呢?梁

¹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

²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

³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

启超说：“譬诸木然，非岁岁有新芽之茁，则其枯可立待；譬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涌，则其涸不移时。”¹好比一棵树，如果不是每年都长出新芽，那它早就枯死了；又好比一口井，如果不是时时有新泉喷涌而出，那它早晚也会干涸。国民的性质也是如此，世界变化万千，如果国民对世界和外界的认识不能够与时俱进，随之更新，就会如同历史所呈现的、国家落后的局面。因此，对于国民而言，“濯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浚之，厚其本原；继长增高，日征月迈，国民之精神，于是乎保存，于是乎发达。”²面对国家已经落后的事实，“欲惟新吾国，当先惟新吾民”，对国民进行改造是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首要任务。

二、欲新民，必开民智

为实现“新民”，梁启超进行了许多理论建构。1896年，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在《变法通议》中，他认为发展教育是救国和新民的第一要务，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愚”。

其一，纵观他国经验发现，国家之间实力的博弈实质上也是国民智慧高低的竞争，国民智慧的开化需要依靠教育去实现：“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³然而反观中国，梁启超指出了过去在探索国家自强之路时对教育关注的不足：“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⁴

可见，洋务运动作为国家谋求自强路上的尝试，虽然大力发展了许多产业，但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没有看到教育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不仅学校缺乏教师，稍微聪颖的学生均遵循旧教育、只为仕途和荣华富贵，官员制度使学生即时学成了也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价值。如此，正如梁所说：“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于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棼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⁵如果不对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加以重视，那么，产业发展的再好，却还是没能解决国家发展中的本原问题。

梁启超正是看到了其他国家国力的强劲的原因，如果说以前的蒙古还可以凭借其过人的体格进行掠夺和屠杀，那么近百年的世界中，西方国家的强盛则凭借其智慧的开化在技术、工业、军事等层面的影响，于是“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

¹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

²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

³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

⁴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⁵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平；胜败之原，由力趋于智。”¹

因此，梁启超得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的结论。如果说在过去，国家之间以冷兵器为主导的战争可以靠战士的勇猛获得胜利，那么在当今世界，国家的强弱对比早已不是全凭所谓的蛮力就能取胜这般简单，而是要靠“智”。可见，“智”对于国家的发展而言，既是国民意识觉醒所体现出的国家特质和国家精神，也是通过“智”打造出最先进的技术、发展最蓬勃的经济、从而增加国家综合实力。那么如何能够发展“智”呢？梁启超认为“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²也就是说，发展智力的关键，就在于发展教育。

其二，“新民”只能通过国民“自新”实现，而发展教育是“自新”的唯一途径。“夫新芽、新泉岂自外来者耶？”³树上开出新芽、井里涌出新泉，这难道是外力可以帮助它们实现的吗？显然不是，而是树木和井泉通过自身更新去实现的，国民“开智”亦是如此。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家落后挨打的现实能够帮助国民“开智”吗？显然不能，这些外界因素能够发挥的最大影响是唤起国民的爱国情感，而国民真正想要帮助国家实现强大的唯一途径，就是接受教育，摆脱过去的愚昧，学习先进技术，通过接受教育后的力量推动国家在世界行列中前行。因此，“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若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⁴只有发展教育，让国民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国民愚昧的现状，为国家强盛创造可能性。

三、开民智，首选女智

在阐明了教育是救国新民第一要务的基础上，梁启超进一步指出，“积弱之本，自妇人不学始。”因此，“开民智”的首要选择是“开女智”，原因有二。

其一，梁启超发现西方强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发展了女子教育。

“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是也。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⁵

譬如前文提到的日本明治维新，日本在改革进程中以法律保障的形式，明确规定女子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同时，学者作为代表鼓励女子进入学校，梁启超认为，这种做法的直接效果就是大大提高了全社会女子的素质，当曾经被禁锢于家庭中的女性都能够摆脱愚昧，那么，整个社会的教育风气都会蓬勃向上，当全

¹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²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³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

⁴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⁵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民都能够通过教育逐渐摆脱愚昧，国家的进步也就指日可待了。

其二，女子摆脱愚昧后作用于国家发展的表现在于：通过接受教育，女子能够走出过去依赖男子而活的境遇，通过参与社会劳动保障自身基本生存需要，从而减轻男子的负担。当女子也能够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积累更多的生产资料；通过素质提高，女子在传宗接代的过程中，能够为后代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和文化熏陶，从而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综合素质。当后代素质得以提高，就能够促进国家方方面面的发展，帮助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现状。

综上，梁启超提出的救亡图存之路为“新民”，而“开民智”是“新民”的必要选择，同时，“开女智”又是“开民智”最重要的一步，正是基于此，梁启超提出了“兴女学”的思想。

第二节 “开女智”的理论实现

那么，“开女智”究竟如何实现？梁启超在《论女学》一篇中进行了集中的阐述，他说“然吾推极天下极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¹他从经济、进化论、胎教和母教等方面分析了国家积弱的根源在于“妇女不学”，强调了“兴女学”一事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由“分利者”到“生利者”

梁启超首先从经济的角度说明了女性生活疾苦的原因²，基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国家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众生活普遍穷苦，有工作、能养活自己、甚至创造社会财富的男性本就不多，而女性全部属于“分利”状态，即没有工作、无法依靠自己获取生存的基本条件，只能分有男性的劳动所得。在这种只能通过依附他人而活的情况下，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基本人权，女性在这期间所遭受的苦难不言而喻。

女性要想改变“被以犬马、奴隶畜”的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养”，成为不再需要依附任何人的“生利者”。然而，女性实现“自养”并非易事，一方面，“盖凡天下任取一业，则必有此业中所以然之理，及所当行之事，非经学问不能达也。故即以男子而论，大率明达事理之人，谋业甚易，反是者谋业较难。然则学也者，业之母也，妇人之无业也，非天理宜然也，其始据乱之世，专尚力争，彼男子之所欲有事者，固非妇人之所能也。于是以妇人为不足轻重，而不复教之，既不教矣，其无从执业，有固然也。积之既久，渐忘其本来，则以为是固当生而不事事，

¹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² “中国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视之，已不可以为国矣，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而嗷然待哺于人也。”¹人们从事任何职业，都需要具备该职业所要求的本事和能力，如果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教育和培训，是无法上岗的，这又陷入了另一个困境，即女子历来被冠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标签，自然无法享有和男子接受同样教育的权利，也就无法找到“自养”的途径。

因此，梁启超女学思想的提出将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困境，倘若女子能接受教育，一方面，“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的现状将得以改变，女子能够从家庭走进社会，获取成为“生利者”的必要资料，摆脱过去只能被动靠男性供养的局面，这对于当时的广大中国底层女性而言，是一次真正发现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当然，另一方面，梁启超说：“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²那么，他提倡女子接受教育、鼓励女子走向社会参加工作当真是为了女性的解放所考虑吗？也许有一部分是，但不全是，因为他在这个时期更加关注的是国家命运，他也时刻在字里行间也露着这种担忧，也就是说，鼓励女性成为“生利者”的根本出发点似乎仍在于挽救国家经济，谋求国家的富强。

二、由“妇学”到“母教”

除经济外，梁启超还提到了“兴女学”对于教育下一代的影响。一方面，“母教”的影响。他吸收西方的教育思想，认为“孩提之童，母亲于父，其性情嗜好，惟妇人能因势而利导之。以故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³过去小孩子的童年大多时间呆在家庭之中，因而在他们的学习与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十分重要，尤其是母亲的陪伴和影响。母亲正确的引导不仅能够培养孩子良好的性格，以获益终身，也能够让孩子在十岁之前“于一切学问之浅理，与夫立志立身之道，皆可以粗有所知矣。”⁴如此一来，其积极影响也将指向国家前途，他说：“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⁵因此，母亲本身的性情和学识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她们自身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培育出的孩子才会知书达理，成为一个对国家与社会有贡献的人。

另一方面，“胎教”的影响。西方人的“保种”和进化思想给了梁启超诸多启示，他首先认为，人体中的胎儿和花草树木一样，有的会死去，有的存活，存活下来的胎儿则会被生下来，生命也将延续不断，是曰“传种”⁶。在这个过程中，按照进

¹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²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³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⁴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⁵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⁶ 西国公理家，考物种、人种递嬗递进之理，以为凡有官之物，一体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如一草木，根茎枝干、果实花叶，其死者也，而常有不死者，离母而附于其子。绵绵延延，相续不断，是曰

化论的思想,人类是在不断进步的,也许短期之内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长此以往就会有质的飞跃,就如同猩猩猴子演变为现在的人类。他还说“故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¹所谓胎教,即怀着孕的母亲对于腹中胎儿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常习体操的孕妇生的孩子是“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而生的孩子强壮了,国家强兵一事自然指日可待。

可见,不论是从母教影响孩子性格与学识、从而影响国家兴亡的角度,还是胎教与进化论对于孩子体格与人类进步的好处,梁启超至始至终还是以国家前途与命运作为第一要事,在这一部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他眼里,母教、胎教,包括女子教育只是帮助国家实现强大、民族实现复兴的手段,如果用更为露骨的说法,女性只是他为救亡图存所做努力中的工具之一。

三、由“国母”到“新民”

“欲惟新吾国,当先惟新吾民。”这是梁启超救国政治理论的核心思想,如何“新民”?他认为“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中国积贫积弱而西方先进强盛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愚”,因而开民智是第一步。但是,眼下的一代中国人已经在封建和愚昧中成长与生活,改变他们是不容易的,最迫切地需要改变的是下一代国民,这也正是梁启超如此重视教育的原因。对于下一代人的教育,女子作为未来的母亲,她们在其中可以发挥的作用绝对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梁启超才大力倡导“女学之兴”,旨在提高女子自身、更重要的是下一代国民的文化水平,从而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开民智”由此与“兴女学”紧密相连,女子也肩负起了成为“国母”的任务。

到“国母”为止,女性在梁启超救亡图存学说中的作用似乎已经被诠释地很详尽了,不难发现,这期间梁启超始终是站在国家命运的角度去考量女性在其中可以发挥的作用、或者说可利用的价值。“国母”一词,毕竟已经从国家的层面出发对女性责任赋予了高度评价,但是,女性的身份似乎仍然是某某的母亲,她们是因为要成为一个怎样的母亲而存在、而努力吗?当然不是,在梁启超新民说中,“女学之兴”可以到达的最终彼岸是女性本身成为“被新之民”,而且在梁启超对女性的描述中,她们也完全有优势和能力可以为国家前途出力:“然而男女之于学,各有所长,非有轩轻……妇人苟从事于学,有过于男子者二事:一曰少酬应之繁,二曰免考试之难。其居静,其心细,故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穷之理,而妇人穷之;男子所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²比起男子,女子并非天生愚钝,而是没有予以教学和引导,同时,由于女子天生的性格特征也有着男子无法比拟的优势,因

传种,惟人亦然。”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¹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²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而女子本身是可教的，也是有巨大发展潜力的，而这些优势远远不仅可以用于成为一个优秀的母亲，也能够成为一个有德、有学识的社会人，一个梁启超所期待的新国民。

第三节 “开女智”的现实实践

梁启超的女学思想之所以内涵丰富、影响深远，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理论逻辑周密而严谨、论述精彩，另一方面，也确实因为他通过现实中的诸多行动去支撑着自己的学说，为“兴女学”和挽救国家前途做出不可磨灭的现实贡献。

一、戒缠足

梁启超在《戒缠足会叙》一文中提到，针对女性的世界三大酷刑，它们分别是中国女性缠足；非洲、印度女性以石压首；17到18世纪，欧洲女性用缠腰夹裹腰。正是这三个罪大恶极的酷刑，使世界女性受害极深。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崇尚缠足呢？一方面，这是因为女子裹脚后由于脚板不足以支撑她们平稳走路，走路的姿势看起来婀娜多姿，引得男子喜欢；另一方面，古代社会认为裹脚能够让女子呆在家中，安分守己。那么，裹足对女性身体和心理有着如此多危害，古代女子还是要继续裹足呢？这是由于社会普遍观念的影响，只有裹足的小脚女性才好出嫁。唐朝之后，经由诸多文人的恶劣鼓吹，缠足的风气更加盛行，尤其是到了清代，更是达到鼎盛，达到一种“父母以此督其女，舅姑以此择其妇，夫君以此宠其妻”的境况。

如果说“女学之兴”是对女性思想层面的突破，那么，梁启超对于缠足的激烈批判则是对女性身体的直接解放，关于他支持戒缠足的原因，1896年发表在《时务报》上的《戒缠足会叙》一文中详细的说明，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缠足是一件极为残忍的事情，其最直接的危害是对女性身体的摧残。对于女子缠足后的情况，他写道：“乱齿未易，已受极刑，骨即折落，皮肉溃脱，创伤充斥，脓血狼藉，呻吟弗顾，悲啼弗恤。”如果女性在缠足过程中哀求和抵抗，则“数月之内，杖而不起。”¹

其二，缠足对女性的摧残使得“女学不兴”，国家不盛。

“今中国之妇女，深居闺阁，足不出户，终身未尝见一通人、履一都会，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以此从事于披风抹月、拈花弄草之学，犹未见其可，况于讲求实学，以期致用，虽有异质，吾犹知其难矣。不宁惟是，彼方毁人肢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废疾，一以人为刑戮，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学，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²

¹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²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在缠足的情况下,女子足不出户,整日孤陋寡闻,连人都不得见,又如何能够接受真正的教育呢?因此梁启超说“是故缠足一日不变,女学一日不立。”¹倘若女子不能学,那么梁启超所主张的“开民智”、“欲新民”、乃至强国最终都只能是一纸幻想。

其三,戒缠足是世界历史之发展趋势。“非洲、印度之压首,欧洲之细腰,今其地好义之士,各合变力,思所以豁去之,殆将变矣。”²梁启超看到了非洲、印度、欧洲对压迫女性之陋习的破除,深有感触,但正是碍于“旧污太深,奉行不力,沿谬蹈敝,仍数百年”,因此戒缠足一事面临着诸多阻力,这也为他创立“不缠足会”奠定理论基础。

1897年,梁启超联合众多维新人士在上海创立“不缠足会”,这也是他正式通过实际行动投身到反缠足运动的开端。首先,他亲自制定了《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明确了立会的目的,即:

“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择婚,故特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渐光,革此浇风。”³

其次,尽管该举动已经在当时显示出强大的声势,为扩大社会影响力,梁启超还充分利用舆论的力量,他以报刊为阵地,不仅亲自撰写文章对不缠足思想和各地戒缠足的情况进行介绍,同时还刊登一些外国人对中国女性缠足之俗的批评文章,如《中国妇女宜戒缠足说》、《劝中国女子不宜缠足》等。这些思想通过舆论的力量被广泛传播,在梁启超等人的带领下,掀起了一股不缠足的新风。

最后,梁启超也将不缠足思想告与自己的妻子李蕙仙,在海外流亡期间,他十分关注妻子放足的情况,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曾说:“卿已放足否宜速为之,……此间人多放者,初时虽觉痛苦,半月后即可平复矣。”

由此可见,不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梁启超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于戒缠足的呼吁,虽说在他的理论中,戒缠足是为了“兴女学”,“女学兴”则国家兴,或许最终指向的还是他苦心耕耘的政治,体现的还是他对于国家前路的深深担忧,但从戒缠足一事他对女性痛苦的同情和对女性身心健康的关注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女性的深切关怀又是真实的、不可否认的。

二、办女校

其实在维新变法之前,陈虬、郑观应就曾提出过办女学的想法,但是并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一直到维新时期,“我有民焉,而俟教于人,彼所以示辱我

¹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²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³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也，无志甚矣。”¹这些维新志士看到传教士在中国办起女子学堂，对于外国人来教育本国女子这件事，他们受到极大刺激，而这也激起了他们的办女学热情。于是，他们决心在中国倡办自己的女学。²

如果说对戒缠足的呼吁是从生活行为方式层面对女性身体的解放，那么办女校则是梁启超向女性推广教育的直接尝试。1897年，也就是在《论女学》发表的第二年，梁启超与经元善等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即上海经正女学堂。这所学校的创办过程并不容易，梁启超先是用《女学会书塾创办章程》和《创设女学堂启》等文章在舆论上做足了准备，其次，就是资金筹备的难题，当时支持维新变法的民族资本家经元善深感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决定出资筹划，他说：“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女校，而学校本原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兴女学。”³于是，经元善联合一众进步分子具体商讨捐款、学堂建设和章程等事项，并召集中外妇女举行“裙衩大会”，为女学堂建设的方方面面集思广益，经这般努力，经正女学堂于1898年5月正式开学。

经正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女学堂，其意义自然是重大的，不仅为女子接受教育提供了名正言顺的机会和场所，更是以开先河之创举推动了女学的兴盛。然而，这是基于它对于中国女学长远发展的考虑，那么，经正学堂的创办对当时实际入学的女学生本身而言有什么影响呢？首先，从积极影响来看，经正女学的教学内容是“中西并举”，这对于学生知识面和国际视野的拓展都帮助极大。当时为经正女学的创办做出突出贡献的传教士林乐知就说道：“西人办学，病在偏重于西学，而轻于中学；夫中国设塾延请西人教习，其病在偏重于中学。”⁴经正女学作为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校，要想避免林所说的弊端，自然要在西学的课程上予以相应的关照，这也体现了进步分子在当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发展西学的决心。⁴其次，从局限方面而言，一方面，经正女学的管理十分严格，不仅所有教职工均由女性担任，同时也不允许男子进出，可以理解的是，此举是为了女学堂内的管理和对第一所女校的小心呵护，但是阻断与外界的交流，这与禁锢女性的行为有何异？另一方面，女学堂招收8至15岁的少女入学，声称“主学之意，义主平等”，然而实际上坚持的却是“必择良家闺秀”，将奴婢、娼妓等在当时身份低微的群体阻于门外。⁵这说明该学堂并未将所有女性视作平等，又何来真正的男女平等？再者，经正女学的教育方针是培养“贤妻良母”，《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指出：“其教育宗旨，以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

¹ 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² 雷良波：《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³ 章开沅主编，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页。

⁴ 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⁵ 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¹可见，该女学堂旨在通过对大家闺秀的培养，使她们成为优秀的妻子、母亲，而非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自我。

因此，不论是从经正女学招收学生的标准、还是教育方针来看，它都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诚然，它为女性接受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并且教授内容以中西并举，包含了诸多先进的现代科学学科，但是它的根本目的仍然不在于帮助女性成为独立意义上的人，而是使出身于良好家庭的女学生能够成长为协助丈夫的妻子、教育孩子的母亲，最终有助于国家的复兴。但是不管怎么说，经正女学终归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尝试，它已经在挑战封建伦理的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也正是由于它的先进意义，当时国内的封建保守势力对其进行了弹劾和攻击，于1900年停办。

第四节 与同时期女学思想的异同

除梁启超外，还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清王朝正蹒跚地步入暮年之时、在面对西方列强不断扩张与西方思潮的涌入之时，他们的内心也被深深刺激，引发了他们对于民族觉醒、封建秩序、乃至女性地位的重新思考。那么，这批与梁启超处于同一时期的女学代表思想分别有着何种特征、与梁启超女学思想存在着怎样的异同？是研究梁启超女学思想之独特性的重要参考。

一、康有为《大同书》：大同世界中女性的实质解放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1858-1927）深刻感受到了国家所处的危难境地和国民遭受的苦难，面对这样水深火热的局势，他一直企图探寻一条能够改变现状、挽救国民的道路，他为之所做的努力在《大同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在他看来，那是一个不再有等级差异、没有了国家概念、没有外在条件限制的、独立自主的个人意愿结合的存在。康有为在感叹于西方先进程度的同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暴露出的诸多弊端与难以调和的矛盾，于是他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小康”、“大同”说、今文经学的变易哲学等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进化史观，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康有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种种苦难，并指出了造成这种苦难的九种根源，要想彻底消灭苦难，首先就要消灭这“九界”，于是他在书中具体阐述了消灭“九界”的方法，勾勒出一幅人类社会大同的蓝图。

在这样的大同世界中，康有为也表达了他对于女性的关注。首先，他对于女性被压抑的事实予以激烈的批评，不论是缠足、穿耳等陋习造成的生理痛苦，还是“不得仕官”这种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状况，康有为都认为是对于女性不合理的

¹ 雷良波,陈阳风,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压迫。其次，康有为也看到了这些压抑背后所体现的根源问题，即社会问题。于是他提出“去家界为天民”，康有为认为苦难的根源是家庭，想要实现大同，就必须消灭禁锢了人们的家庭，构建以个人为社会单位、基础资产阶级理论为结构的社会。而所谓“去家界”就是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从根源上冲破封建宗法关系和纲常名教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提倡的人权、自由、平等、独立和个性解放。这就从制度上将女性从原来的牢笼中解救了出来。除此，康有为本人非常肯定女子对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他说：“尝原人类得存之功，男子之力为大，而人道文明之事，借女子之功最多。”¹但是，历史却不记载这些，男子又贪功，女性的作用被忽视了，可见他对于女性的关注是深刻的。

康有为对女性的关注也不仅仅表现在《大同书》一作中，他曾在《实理公法全书》中专立“夫妇门”，阐述男女平等的观点，也上过《请禁妇女裹足折》提出禁止女性裹足的建议，更是通过不给自己女儿缠足等实际行动反对一切摧残女性身体的陋习，他也积极参与有助于实现女性解放与独立的社会活动。同时，康有为对于教育也非常重视：“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²在他看来，发展教育是大同世界进步的推动力。

作为康有为的学生，老师的这些观点必然也对梁启超思想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康有为大同世界中的男女平等和进种思想对梁启超开展办女子学堂的实践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梁启超在分析老师的学说时就曾提到：“进种改良欲造大同之世界，不可不使人类有可以为大同公民之资格，故进种改良为最要焉。……先生之议，以为女子平日当受完全之教育，不待言矣。”³在老师描绘的大同世界中，男女是平等的，女子作为公民，同样享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为了提升新一代国民的素质，梁启超在介绍老师的观点时说道“以为士女行乐之所，令其受生之始，已感天地清明之气。及妇人之有身也，即人公立之胎教院。其院必择胜地，院内结构精雅，陶冶性情之具无不备……胎教之学，日精一日，则人种自日进一日。”⁴长此以往，国民的素质会得到提升，国民性也会实现良性发展，按照前文所述，这与梁启超兴女学中的“胎教”思想出发点是一致的，都想通过改造国民从而实现国家自强的目的。另一方面，两人的区别在于，在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中，他想要彻底打破封建家族宗法关系和纲常名教的束缚，虽然他强调胎教的作用，但他也阐述了美好的女性生存状态，表达了对女性最理想、却也最彻底的关注，他意识到“男女同权今泰西虽昌，然去实际犹

¹ 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页。

² 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页。

³ 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9页。

⁴ 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9页。

远。”¹他以美国和澳洲女性参政权利为例,说明了西方男女平等的有限性,那东方的情况只会更严重,但他随之提出:“大同之世,最重人权,苟名为人,权利斯也。”²这种从人与人平等之根本层面去讨论男女问题、从人权去解释女子享受教育权利的观点,在梁启超女学的理论与实践,是没有体现的,与老师相比,梁启超的女学思想是不彻底的。

二、谭嗣同《仁学》:“仁-通”提供男女平等的理论支持

“仁”是孔子心中最高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境界,谭嗣同(1865-1898)借用传统儒学中“仁”的概念,形成了自己的仁学体系。对于“仁”与女性地位和女性解放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讨论。

其一,“仁以通为第一义。”³那么,什么是“通”呢?《仁学·界说》开篇就指出,“仁”的第一要义是“通”,通有四义,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和人我通⁴。所谓“上下通”和“男女内外通”,按照《周易》卦象的解释,是指类似于阴阳、否泰一类,可解释为一种互相调和到达和谐的状态。“人我通”则是取自于金刚经中、类似“众生平等”、“无差别”的状态。

其二,“通”如何为男女平等的解释创造了可能性呢?“通之象为平等”,按照谭嗣同对于“通”的解释,“通”本身具有天地、物我、人我之间感通的性质与功能,它是《仁学》最为根本的宗旨,在现实中则表现为平等,这种平等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想到达到真正的平等,就要破除一切差别对待,人与人之间应该不分你我,生来平等,那么男女同为人,也不应该有任何差别,当现实中的平等得以实现,所期待的“仁”的状态自然就会到来,也就是“通则仁”。

其三,“通”批判了禁锢女性的封建礼教。儒家所说的“仁”与“爱”是有条件的,存在着等级和差异,然而谭嗣同在《仁学》里想表达的“仁”是一种天地万物没有差等才能实现的“通”,由此可见,对于关注等级和秩序的传统儒家而言,主张“仁-通”实质上已经站在了传统儒家的对立面,也就是书,谭嗣同是排斥封建礼教的。在传统儒家思想中,仁和礼是内在统一的,仁的存在默认了礼教、既定等级秩序的存在,但是在谭嗣同看来,仁和礼的关系是:斥礼则达仁,封建礼教对于“仁”的实现和现实的平等而言是一种束缚和压抑。

因此,“仁-通”体系中贯穿了平等的内涵,谭嗣同对于“礼”之弊端的揭露体现了他对于儒家纲常伦理的批判,按照他的逻辑,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作为封建伦

¹ 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9页。

² 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9页。

³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1页。

⁴ “通有四义:中外通,多取其义于《春秋》,以太平世远近大小若一故也;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多取义于《易》,以阳下阴吉、阴下阳吝、泰否之类故也;人我通,多取其义于佛经,以‘无人相,无我相’故也。”见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1页。

理中也是要受到谴责和排斥的,他甚至提出五伦中除朋友这一伦能体现出平等之外,其他的四伦都应该发展为朋友一般的关系,这样才能体现出真正且广泛的平等,因而他抛却了传统五伦中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四伦,只保留朋友这一伦作为社会和政治上的交际准则,这充分体现了其思想的激进性。

三、严复《论沪上创兴女学》:言行不一的女学观

严复(1854-1921)对女性追求解放的态度是积极的,他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对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旧俗予以了激励的批判。而严复对女性解放的理论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女学和婚姻。

第一,发展女学既是改变国人愚昧的切入点,也是利于人类进化的现实途径。首先,严复说:“窃谓中国不开民智、进人格,则亦已耳必欲为根本之图,舍女学无下手处。”¹在他看来,如果说广开民智是帮助国人摆脱愚昧的方法,那么女学就是开民智的首要进路。其次,严复为什么会深刻地认识到女子接受教育对于改变国人愚昧的重要作用呢?这与他接受了西方人类进化论思想有关。一方面,他认识到了母教和遗传对提高国民教育水平的重要性,人生下来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善恶需要依靠后天的引导,而孩童接受教育首先来自于家庭的熏陶,其中母亲的作用尤为突出,因此,母亲的文化程度、品德修养对于一个孩童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教育的切入点首当其冲应该是女子教育²。

另一方面,他意识到女子在社会变革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严复看到历史中凡是发生重大变革之时,女子都会成为其中的主要推动者³,在当时危机四起的民族动荡中,他也寄希望于通过女性的力量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贡献一点力量,那么如何让一直被“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所禁锢的女性站出来呢?需发展女学。

第二,严复为什么强调婚姻的作用?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女性力量在社会变革中起到的作用,至于女性这种强大的影响从何而来,严复认为是男女关系、家庭关系,这两者都指向了婚姻。一方面,他通过强调婚姻的重要性阐明了男女平等。严复认为,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层,和谐的夫妻关系必然要建立在男女之间的平等之上。关于男女平等,严复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政论文章中阐述其对于“天赋人权”这一观念的理解,他批判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态度,认为男女不平等正是违背了“天赋人权”的原则,并强调女子教育是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也是男女平等的现实表现。另一方面,在婚姻观中,他提倡婚姻自由,

¹ 严复:《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89页。

² “盖性无善恶,长而趋于邪者,外诱胜,而养之者无其术也。故受教莫先于庭闱,而翫善莫深于慈母,孩提自襁褓以至六七岁,大抵皆母教所行之时;故曰必为真教育,舍女学无下手处。”见严复:《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89页。

³ “且治进化之学,则观物必于其微。每恨常俗之人有见于显,无见于幽。须知无论何级社会,女权本皆极重,观于中西历史,则大变动时,必有女子为之主动之力,此治史学所同认也。”见严复:《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3页。

反对包办婚姻，在《法意》中他说：“婚嫁之事，宜用自由，使自择对。”他还反对早婚，认为早婚不论是对胎儿的质量和家族的经济而言都是不利的，这与国家强弱息息相关。除此，他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打破宗法制的禁锢才能够帮助女性实现真正的解放。

可见，严复的女学思想其实是相当先进的，他不仅仅在女子教育方面提供了许多有力的理论支持，还在女性解放的现实层面，如婚姻自由等方面给了许多具体的建议与呼吁，这对当时的社会而言，无疑也是一次思想上的里程碑。然而，现实中的严复并没有贯彻自己的女学思想，他的理论与实际生活是相互矛盾的，譬如他也对婚姻自由的弊端进行了抨击，还不允许自己的子女自由结婚等，他一边为女性解放摇旗呐喊，一边在自己的行为中仍然依循旧习，这种矛盾凸显了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思想之间激烈的碰撞。

而论及严梁二人之间的交流，可以发现严复对梁启超的女学思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其一，严复曾将《天演论》寄给梁启超，他对西方进化论思想的阐释对梁启超提出“胎教”具有直接的支撑作用。前文中提到梁启超十分重视“母教”对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作用，“母教”一方面体现在对新生儿的培养中，另一方面体现在“胎教”的过程中，如孕妇练操可以使胎儿出生之后“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这显然是对进化论思想吸收借鉴的体现。其二，严复和梁启超均强调“开民智”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严复在写给梁启超的书信中曾提到：“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¹在讨论变法图强的过程中，严梁二人一致认为，国家富强的根本之道在于国民的力量，而改造国民性的根本在于开智，如果现阶段无法通过一代人使国家得以改变，那就通过后代的努力，而对于后代的新国民而言，女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严梁在兴女学是改造国民的根本方法这一意见上，两人是一致的。

四、康同薇《女学利弊说》：女性主体视角下的自我觉醒

康同薇（1879-1974）是康有为的长女，她自幼受到父亲男女平等、废除缠足等先进思想的熏陶，成长为独立的女性代表。她后来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女性杂志《女学报》，为宣传女性解放提供阵地，有关她的女学观点，在其发表于《新报》上的《女学利弊说》中有着详尽的说明。

首先，对男尊女卑的抨击。康同薇在开篇就说道男女是：“形质不同，而为人之道则一也”，也就是说，人对于男女的分别同自然界诸多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样是合乎常理的，但是其地位并没有高低和优劣之分，这是对男尊女卑思想的直面批判。由此，男女所享有的权利也应该是一样的。

¹ 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2页。

其次，康同薇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阐明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与当时进步人士对于女学宣扬的观点类似，康同薇也看到了国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危急局势，同时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她认为女子接受教育对于国家兴盛而言，至关重要。一方面，教育是人类摆脱野蛮和愚昧状态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这种愚昧既包括基础知识的缺乏，也包括对传统腐朽思想和封建礼教的维护，而女子教育的发展是能够改变这两者的关键步骤。

最后，作为进步女性，康同薇倡导女学的目的或许包含了对救国图存的期待，但是她的出发点并非如此功利，因为她真正关心了女子教育的内容，即应该发展怎样的女学？她在《女学利弊说》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过去的女子教育内容被传统的封建礼教所束缚，女子学习的是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妻子、母亲，这些在康同薇看来并不是真正有用的学问，不会帮助女性实现自身真正的解放。

作为一名女子，康同薇在国家危难之时发表救亡图存之见，在自觉吸收先进思想后为女性的命运呐喊，这无疑是勇敢的，她的思想对于女性争取自身的解放、唤醒自我主体意识已经在历史中迈出了一大步。

五、小结

综上，可以从相同点和不同点两个方面去探讨梁启超女学思想与同时期其他思想间的联系与差异。

就相同方面而言，其一，他们不约而同地受到了西方思潮的影响。不论是康有为对资本主义弊端进行猛烈批判、试图构建大同世界，还是严复从人类进化的角度去解释发展女学的进步意义，可见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和社会环境中，这批进步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受到了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梁启超也是如此，在万木草堂的求学过程中，他接触到许多西方书籍，这打开了他向西方学习、探索自强和变法的大门。在女学观点中，他也积极汲取西方教育的先进成分，通过在女子学堂中加入西方科目的学习等实际举措，扩展女子教育内容，促进女性素质提高。

其二，他们都为实现男女平等作了许多理论上的诠释。如康有为通过构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消除阶级和分别、实现男女地位的平等；再如谭嗣同，由“通则仁”出发，解释了在万物平等的基础上，男女也是平等的。这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构建各自的理论，为男女平等提供了根本性的诠释，而只有基于男女平等的前提，女性才有机会和可能性进入到社会、学校，接受教育。

其三，关注女学对救亡图存的作用。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思考如何将国家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打破被动挨打的现状、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是进步思想家们考虑的首要问题。这些思想家虽然分别进行了不同救国方法的尝试，但他们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和努力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女学之兴就是他们探索的方

法之一。不论是构建大同世界，还是批判传统纲常伦理和男尊女卑的旧思想，这些理论的出发点都是从努力实现救亡图存开始的。

就差异方面，其一，梁启超的女学思想与同时期进步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异之一，就在于其实践性。尽管这些思想家都在各自的代表作中表达了对女性的同情和关注、对女子教育的支持与鼓励，却鲜有人真正付诸于实践。而梁启超女学的里程碑意义之一就在于他真正将理论付诸于实践，不论是创办戒缠足会、还是兴办女子学堂，他都通过现实且真实的努力去为女性走出家庭、接受教育提供平台与机会，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提供现实的推动力量，因而具有实践意义。

其二，在兴女学的原因层面，梁启超从其政治主张出发，清晰且逻辑完整地解释了发展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果说其他进步思想家通过构建学说试图为男女平等提供理论支撑、为变法救国批判传统封建纲常伦理和旧思想，那么在女子接受教育的理论层面，梁启超进行了完整的诠释。他从“新民”的第一要务出发，指明了教育对于国力强盛的决定性作用，又从教育的重要性为论点，明确提出女子教育应处于国民教育的首要地位，层层递进，从而演绎了一整套女学思想，并付诸于实践。由此可见，梁启超对女子教育的理解是更为深刻的。

第三章 梁启超女学思想的评价

尽管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晚清进步思想家们对于争取女性地位、鼓励女子接受教育、促进女性现实性解放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具有突破性的理论和实践尝试,对当时的社会观念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然而,由于所处时代的特征,当时的女学思想仍然存在着诸多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背后,是梁启超的进步与保守思想之间、女学之兴与父权社会的背景之间,似乎无法调和的矛盾。

第一节 积极性

一、理论层面

梁启超女学思想的价值首先体现他通过文字和舆论的力量对女学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这直接引发了社会对于女子生存境遇和女子教育现状的关注。比起同时期其他进步人士对女性观的论述,梁启超对女性关注的表达更为直接、集中、完整和激烈,他在 1896 至 1897 年间先后发表《戒缠足会叙》、《论女学》、《倡设女学堂启》、《上海新设新中国女学堂章程》、《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等文章对发展女学的原因、内容和具体做法进行了系统且详细的论述,为宣传女学思想花费了许多心血。胡适曾评价说梁启超最能运用各种字句语调来做应用的文章¹,作为一个优秀的政论家,显然,梁启超在推广其女学思想的方法和效果上都是显著的。

其次,文字和舆论的宣传带来的社会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女性获得关注这件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梁启超更是推动了女性解放的进程。他强调通过戒缠足让女性实现身体上的解放,通过“女学之兴”让女子走出家庭的禁锢,走向社会接受教育、靠自己工作谋生,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这是在鼓励女性从男性的从属地位与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脱,赋予她们一个新的角色和形象,承担起救亡图存的责任。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兴女学思想逐渐被社会所认识 and 了解,即使想通过一次思想的冲击就击溃传统封建礼教的高墙是不现实的,但是也对女性的解放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如台湾学者卢燕贞所指出:“女子教育能在中国普遍展开,迅速推行,梁氏之鼓吹宣扬,力排众难,为千百年之中国教育奠新基,为亿兆女子争取教育之机会,其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所做之贡献,实在是无法估计的。”²

最后,女学思想作为梁启超政治学说的构成重要部分,对它的宣传和推广会

¹ “他不避排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义法’,但他的应用的魔力也最大,尤其是那些‘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急剧变化,而且深深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见马勇:《“流质善变”:梁启超思想之本质》,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01):5-14。

² 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带动国人对救亡图存的信心和努力。所谓“欲强国必兴女学”，在梁启超的学说中，国家积弱的原因在于国人的愚昧，要想摆脱这种愚昧，就需要通过教育广开民智，而国民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女子教育，因为女性在传宗接代中的重要身份，在胎教、母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女性接受教育还能够通过“生利”减轻国家和家庭内部贫困的现状，这两者都指向了国家的复兴之路。因此，梁启超的理论逻辑是十分严密且完整的，这一套学说的问世对于处在水深火热的国民和风雨飘摇的国家而言，都是振聋发聩之声。

二、实践层面

梁启超的女学思想之所以能够对当时社会 and 后世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也在于他并非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建构，而是将丰富的理论付诸于实践，又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和突破。梁启超对于女学理论的实践首先表现在了对女性身体解放的呼吁，梁启超在《戒缠足会叙》一文中批判了中国女子缠足的陋习，认为缠足不仅是对女性身体的摧残，而且有害于社会发展和国家富强。除了在理论层面对缠足陋习进行批判，梁启超还通过对戒缠足的提倡和创立“不缠足会”的实际举动来革除女子缠足的陋习。1897年，他创办不缠足会，并在《不缠足会简明章程》中明确了创办的原因、章程和经费等，这些因素的确保障的不缠足会的顺利创办。而不缠足会取得了很大进展，不久在各地即成立了诸多分会。同时，梁启超做到了知行合一，在家中也不鼓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缠足，对妻子放足的情况十分关心，这些现实行为都体现了他对于女性缠足和悲惨命运的同情，也为女性摆脱缠足痛苦提供了现实借鉴，而缠足的废除给广大女性提供了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机会，自然也创造了女性接受教育的可能性。

其次，他创办女学堂之举更是一次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的大事，自梁启超和经元善首办女学，开社会女学风气之先，一时间全国出现大批女子学堂。在这之前，那些同样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进步人士只是通过理论输出的方式表达对女性的关注，而梁启超率先投入到实践，通过兴办女子学校给女性接受教育提供现实场所。同时，他对于女学堂教学内容的安排也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有中国之学，也有西方的科目，这是一次具有突破意义的尝试，更是为往后女学堂的创办提供了一个范例。

第二节 局限性

一、局限性的表现：“兴女学”之工具性与不彻底性

诚然，梁启超的女学思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性，但如果站在女性主体的视角来看，其女学思想也有着诸多局限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兴女学”的工具

性与不彻底性,实则也是由于对女性赋予的时代责任与加在女性身上的新的枷锁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首先,通过梁启超女学堂的招生条件可以看出,他的女学思想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封建思想的局限。梁启超对女学堂所招学生的对象、人数、年龄和条件按都做了规定:“必择良家闺秀,始族仪型海内,凡奴婢娼妓一切不收。”¹作为开风气之先的尝试,由于人数有限,择优录取,梁启超的规定确实依据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但其对学生条件的这种限制也间接说明他将普通女子拒之门外,并没有将所有女性都视作平等,显然,这仍然属于封建等级观念的限制,且反映出梁启超女学思想在事实层面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其二,所谓责任,即“国母”身份对女性赋予的家国责任。正如前文所说,梁启超的女学思想是其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政治理论中,他提出兴女学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此他提出让女子接受教育,一方面是为了女性能够成为“生利”者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试图改善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女子能够成为“贤妻良母”所期待的样子,这样则有利于胎教、母教,从而培养出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改变国家命运,帮助国家走向兴盛的国民。从家庭的层面来说,“贤妻良母”赋予了女性教育子女、构建和谐家庭关系的责任;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国母”将女性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救亡图存的新高度,这对于在过去几千年都处于压迫地位的广大女子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任务。

其三,所谓枷锁,即梁启超所希望女性通过接受教育成为的“贤妻良母”角色事实上是一种新的禁锢。“女学之兴”对女子来说本应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她们不仅能够冲破传统男尊女卑思想带来的束缚,还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但实际上,梁启超对女学的内容进行了限定,女子接受的教育主张不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进步女性,而是成为一个好的母亲、好的妻子,这的确将女性从受压迫的境遇中拯救了出来,却又让她们陷入了另一种压抑与禁锢,即女性的作用在于服务家庭、服务政治,而不是成为一个独立的自己。

因此,当象征国家气质的“国母”身份与时代责任被强加于女性,女性在这一阶段的解放不过是为了救亡图存所服务,对女性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工具性与功利性的利用。而这种工具性也就导致了女学思想的不彻底性,所谓“国母”不过是梁启超置于女性身上的另一层枷锁,他希望女性能够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为他所期待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希望女性通过摆脱愚昧、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这种观念仍然是一种男性视角主导下的封建思想。

¹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二、局限性的原因：求变愿景与保守现实之间的矛盾

（一）自我矛盾：西学浸入与成长于传统儒家思想熏陶间的矛盾

纵使梁启超为女子接受教育作了理论与实践双重层面的努力和尝试，“但不能否认的是，毕竟，梁启超从小就深受四书五经的影响，他的思想也体现了传统封建化与资本主义并存的特点和历史局限性。他把促进妇女教育和废除缠足作为男女平等权利的出发点，这并非简单的问题，而涉及的是整个中国的改造及优化。¹因此，由于梁启超教育背景和成长轨迹的特殊性，使他本人自身所带有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即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成长过程与深受西学、尤其是男女平等和女权思想影响之间的矛盾。

1.传统儒者的教育

通过探析梁启超女学的主要观点已经发现，虽然他鼓励女子接受教育，但该理论的最初出发点与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女性本身的解放，而是一种服务于政治的考虑。但当梁启超提出兴女学这一主张并付诸于实践之时，站在女性的角度而言，这已经让深受封建压迫已久的她们看到了一丝曙光；站在时代的角度而言，这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突破性尝试。所以当发现他对于女子教育的呼吁实际上在其变法救国的政治学说中已经是框定好的一部分，而女学之兴到最后也只是让女性成为梁启超或者当时的中国社会所期待她们成为的样子，这样的真相对于通过教育对自我解放产生了希望的女性而言，是虚伪的，也是残酷的。

然而，通过回顾梁启超的成长经历，也许就会理解这种背后真相存在的必然性，作为成长于变革时期的人物，他所接受的两种教育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

如果不是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自幼饱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梁启超该按照传统儒者的成长轨迹，考取功名，投身仕途，光宗耀祖。他在《三十自述》中写到“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²可见，梁启超接受的仍然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教育模式，祖父“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在他六岁的时候，祖父开设“怡堂书室”，“该书堂是遍布中华帝国的格式学校中最不起眼的一种，像所有学堂一样，它也是维系帝国统一的重要组成，灌输给帝国子民相似的观念，激起他们共同的希望，还规训他们的言行。”³梁启超的启蒙教材也是四书五经一类，虽然不喜欢八股，但也埋头钻研，后又接触训诂之学，继续饱读诗书。

因此，梁启超的教育是按照培养一个传统儒者的方式进行的，而众所周知，传统儒家尤为重视纲常伦理和秩序，男尊女卑的秩序在儒家的体系里是被默认的

1 孙祖娟：《论晚清视野下的梁启超女性权利思想》，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03）。

2 “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嫌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颇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7页。

3 许知远：《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

规定,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即便是日后接触了西学,也很难不怀疑梁启超思想中保守因素的顽固作用。当然,梁女学的工具性与不彻底性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2.接触西学的过程

正是因为饱受传统儒者教育,梁启超在面对西方文化影响、一步一步走向救国变法之路的过程中,思想发生了诸多变化,中西文化的冲突在他身上也体现得尤为显著,女学思想只是这种冲突下的一个缩影。

首先,梁启超最初接触西学要追溯到十八岁那年:“年十八计偕入京师,父以其稚也,挚与偕行,李公以其妹许字焉。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¹他在坊间偶然得到一本介绍西方的书,第一次知道除了中国以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紧接着,他通过与康有为的接触,发现原来自己所擅长的训诂词章学,不过是“百年无用旧学”²,于是决定退出学海堂,师从康有为。但这时候的梁启超,只是停留在发现未知世界的激动当中,对于西方世界的情况和西方文化,并没有更加细致的了解。

随后进入康有为万木草堂的梁启超收获颇丰,他甚至直指“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这既源于老师康有为的个人学术魅力,也和万木草堂的课程设置有关。“康有为要求学生学习外国政治、风科学,以便理解正在变化的世界。”³于是在课程分类中,康有为既延续传统儒家要求的内容,也加入了有关西方人文历史的学习。在这种中西兼并的学习环境下,梁启超固然是深刻感受到了与传统儒家学习截然不同的一面。然而,通观万木草堂的课程设置,虽然涉猎广泛,但实际仍然以旧学为主,其学纲是标准的儒家体系,以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设想分为四大纲目。根据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所记也可以发现,康有为的教育仍然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⁴因此,梁启超每日所学不过是:“日课则《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⁵西学在这一时期的教育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梁启超通往西学的大门,却也不足以给予梁启超系统的、完整的知识内容,更多的只是起到一种与旧学对比的参照作用,

直至甲午战败,国难当头,一方面,梁启超已经对腐败的清政府完全失望,为了挽救国家水深火热的局面,他意识到如果不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时代已格

¹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7页。

²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见许知远:《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

³ 许知远:《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3页。

⁴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3页。

⁵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7页。

格不入的糟粕和落后思想，国家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自强，于是，他开始激烈地批评传统，试图用自己所接触到的西方先进思想去改变中国现状。另一方面，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这期间他的西学有了很大长进。他既可以间接学习到在国内接触不到的西方思想：“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本等本源之学，几无一书焉。”¹又能够亲自考察明治维新对日本的影响，在此期间，他正是看到了日本由于学习西方所带来的国家强盛之实际效果，于是，“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²他在政治观念上完全放弃了托古改制的老套子，承认西方的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自有其本原，优胜于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

由此可见，从初次接触的好奇、到求知若渴、再到应用的尝试，梁启超学习西学的过程是分阶段的，这期间他对于传统儒家文化和西学的态度也一直在发生转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之目标，他一边主动接受西方先进思想，试图用西方思想的方方面面去改变中国之弊，譬如他意识到发展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可是另一边他又摆脱不掉传统儒家等级秩序的束缚，虽然鼓励女子接受教育，但这种鼓励也是有条件的、不彻底的、带有政治目的性的，为了服务于他的救国论，将所谓的时代责任加于女性身上，期望女性可以成为他理想中的“国母”形象，这样一来，女性发展的终点只是成为封建伦理纲常和男性希望女性成为的样子，而这并非基于真正的男女平等，因此对于女性而言，她们仍然没能挣脱封建的牢笼，反而被加上一层新的、时代的枷锁。

我想这对于夹在两种文化因素影响下的梁启超而言，是必然的，也是无奈的。

（二）社会矛盾：女学之兴的尝试和父权社会枷锁间的矛盾

除梁启超自身带有的文化冲突外，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层面的矛盾则显得更加根深蒂固和不可调和。“女学之兴”绝不仅仅是女子教育能否蓬勃发展一方面的问题，它背后折射的根源是父权社会控制下女子被忘却、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历史悲剧，是女性地位仍处于父权社会中边缘化的事实。那么，作为一个自小饱受传统儒家教育熏陶、同时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在国家命运风雨飘摇之际提出了“兴女学”的梁启超，他在面对父权这一事实的时候，是直面还是回避？他在为女性地位与权利摇旗呐喊的时候，是出于真心还是功利？我想，带着这样的思考和疑虑去审视梁启超本人及其女学思想，不论是对于他还是所有中国女性而言，都是更为公正和合理的。

“三千年的妇女生活，早被宗法的组织排斥到社会以外了。妇女是零畸者。妇女才是被忘却的人！除非有时要利用她们，有时要玩弄她们之外，三千年简直

¹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²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7页。

没有什么重要。”¹

这是陈东原对宗法制社会中的妇女最悲惨、却也最实在的描述。“女性是宗法制的受害者”这一观点似乎一直被广泛默认并持续至今，或者更确切地说：

“西周的宗法制以及自宋代始平民化了的家族制，我们可以统称为宗族制。宗族制是中国古代性别对立和男性统治的源头，性别政治反过来又成为宗族制以及男权国家制度的基础。直到今天，这个互为因果的格局仍在不动声色地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²

而不论是宗法制还是家族制，当家族和社会都开始以男性为主导时，这一局面对女性最大的不公与迫害就在于，同样生而为人，女性永远只能处于附属地位，对于男性需凡事顺从，久而久之，男尊女卑这一思想变得根深蒂固，体现在现实的每一个角落。

那么，当时的儒家代表人物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呢？孔子关于性别的相关论述不多，他针对女性的语录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以及《阳货》中那句“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两句常被视为孔子歧视女性的证据。在前一句中，孔子将妇人从“臣子”这一对象中剔除，否定了她们同男子一般拥有治国和治天下的权利，因而在孔子看来，女子是不能够参与国家大事的。后一句则直接将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但“《左传》中说的君子、小人的地方，凡在春秋前半者多用作贵贱之分，至后半始有用作受过教育的人及未受过教育的人的分别。《论语》中后一种尤众。”³由此可见，将女子与小人视作一个群体并非是在歧视和侮辱女性，在极为重视教育的孔子看来，一方面，女性因为没有受过良好的社会教育确实处于被统治和受压迫的地位，当男性们通过接受教育追求仕途和个人发展的时候，她们却无法置身于官场之中参与政治事务的协理，只能帮助自己的丈夫和家族处理内部琐事，但另一方面，孔子似乎并没有对男性主导社会这一现象提出质疑，也就是说，孔子本人对于这种至少在政治领域里真实存在的性别不平等，是默认的态度。此外，身为教育家，孔子没有女学生，身为政治家，孔子也并未将女子视为政治领域内需要讨论的对象，他对于性别的这种态度，影响非常深远，直到朱熹注“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说道：“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庄以莅之，慈以畜之。则无二者之患矣。”儒家用“平患”的说法去说明君子对妇女和小人的态度，与其说这是一种性别歧视，不如说是出于对秩序、对安定生活的一种追求和崇尚。当这种崇尚一旦触及甚至危及到政治与家族的安稳运行，父权社会的特征就又会立刻

¹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² 邓炎：《中国宗族父权制建构史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³ 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显现，而这或许也是梁启超在面对性别问题时不可避免的矛盾。

总之，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边缘化地位成了一条被默认的道理，东汉班昭在《女诫》开篇就写道：“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人下也。”如果说一个人的悲哀自她出生那一刻起就决定了，那么全体女性之悲哀则自父权社会之始就是注定的，这种“生来便低男子一等”的思想伴随了女性的一生，而且不容被挑战。不仅如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也毒害着女性的身心，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无需接受文化知识的教育，只需要按照他们的期待，完成社会发展中需要女性去完成任务，这极大约束了女性发展的可能性和自我意识。因此，我认为，父权社会下女性的悲剧，表面上是性别差异造成的地位不平等，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或者说价值观对女性的压抑。在几千年形成且固定的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社会中，女性地位卑微是一件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传统儒家所推崇的三纲五常和秩序规定了女性的定位，这种影响对于人和社会来说都是根深蒂固的，直至现在都难以说完全改变，可见在梁启超最初提出兴女学时所遭受的反对之音。

总之，面对父权社会这样一堵高墙，女学真正之兴和女性解放都只能是一种奢望和幻想，没有站在女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角度去提出女性的观点，女性永远只能活在父权为其框定的圈子中，无法实现自我的真正觉醒和解放，无法作为同男子一样的人去呼吸、去接受教育、去为了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类人而努力。

结语

通过对梁启超女学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参考和具体内涵的考察，可以看到其女学思想的重要价值。其一，梁启超真正实现了女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晚清及以后的女子教育提供现成的范例；其二，女学思想作为梁启超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救亡图存之路的探索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女性自身的解放而言，通过对教育的重视也极大促进了女性作为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其三，当然，梁启超女学思想的局限性和诸多矛盾也随之浮现。对于梁启超自身来说，生于特殊的时代变革时期，从传统儒家教育中成长、又从西方先进思想的沐浴中走出，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的矛盾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女学来说，它的提出是女性在社会中的进步，也是先进思想在社会中迈出的一大步，但同时，它面对的是数千年的封建礼教和纲常伦理，这些思想愈是坚固，女学思想与传统社会伦理秩序的矛盾与冲突则愈激烈。

然而，本文虽然指出了在封建伦理的残存下，女学思想与女性解放面对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也指出这背后的原因是父权社会控制下，女性地位所受到的压制，然而，对于父权社会产生的原因及其更深层的特质和表现并未作详尽说明，这要从封建制度的起源说起，然而这背后的历史及其影响或许才是女性在追求解放的道路上最大的难题。

最后，对于女学发展和女性解放的现实途径，从女性自身而言，需要通过接受优质的教育认识到自我人格的独立性和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在社会中为女性争取更多的权利；从社会和他者视角而言，诚然，封建伦理的思想已经在历史上繁衍了数千年，而封建制度瓦解距今不过数百年，女性追求解放的路途任重而道远，但是，对于经梁启超这样的进步人士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已经从封建、闭塞和愚昧中走出来的国家和国民们来说，我想，只有饱含同理心，用无差别、平等、开放、包容的态度去看待性别问题、乃至世间所有带有差异性的存在，人类文明才算是真正的向前迈步。

参考文献

（一）原著

- [1] 康有为.大同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2] 孙应祥著.严复年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 [3]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4] 梁启超.梁启超文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 [5] 章开沅主编,虞和平编:经元善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 [6]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7] 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8] 梁任公.饮冰室全集[M].中央书店,1935.

（二）研究专著

- [1]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9.
- [2] 许知远.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3] 夏晓红.阅读梁启超:觉世与传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
- [4] 李汝珍.镜花缘[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9.
- [5] 吴天任.康有为年谱[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 [6] 程谔凡.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
- [7] 李竞艳注说,李贽.焚书:续焚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 [8] 夏晓红.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9] 孙应祥.严复年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 [10] 邓炎.中国宗族父权制建构史纲[M].九州出版社,2012.
- [11] 马勇.晚清二十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 [12] 郭松义.中国妇女通史.清代卷[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
- [13] 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4] 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增订本[M].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9.
- [15]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 [16] 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 [17] 张莲波.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历程(1840-1921)[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 [18] 章学诚.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 [19] 刘慧英.遭遇解放:1890-1930年代的中国女性[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 [20] 吴其昌.梁启超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 [21]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22] 孙应祥.严复年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 [23]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 [24] 林吉玲.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发展史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 [25] 吕滨,新民伦理与新国家:梁启超伦理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 [26]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 [27] 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28]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29] 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
- [30] 韦钰,中国妇女教育[M].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 [31] 孙石月.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
- [32] 雷良波.中国女子教育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
- [33] 黄新宪.中国近代女子教育[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 [34] 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 [35] 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 [36]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84.
- [37]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 [38] 李泽厚.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 [39] 杨廷福.谭嗣同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三) 学位论文

- [1] 李莹莹.维新时期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成因、表现及特点[D].山西师范大学,2013.
- [2] 梁丽英.晚清女学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2.
- [3] 曹娟.谭嗣同仁学体系中的妇女解放思想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0.
- [4] 李晶.由女学到女权—梁启超女权思想探究[D].首都师范大学,2009.
- [5] 史莉琴.梁启超女学思想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7.

(四) 期刊论文

- [1] 方国安,薄金鑫.梁启超近代女学思想与女权主义[J].黑河学刊,2020(03):54-55.
- [2] 田德荣,高天悦,王计永.从“兴女学”看晚清女子教育[J].文史探源,2019(06):149-152.
- [3] 史莉琴,肖发荣.梁启超“欲强国必由女学”说探析[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8,27(02):59-63+71.
- [4] 马勇.“流质善变”:梁启超思想之本质[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01):5-14.
- [5] 徐矜婧,高妍.康同薇、康同璧女权思想之异同[J].戏剧之家,2017(07):273.
- [6] 冯丽.梁启超女学思想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01):30-33.
- [7] 李斯.论梁启超的兴女学思想[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35(05):91-95.
- [8] 刘堃.“理而情”的选择:论梁启超早期女学思想[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2):94-102.

- [9] 郑永福,李道永.梁启超的妇女解放思想[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2(01):152-155+175.
- [10] 张敏.《仁学》与现代妇女解放[J].船山学刊,2010(01):205-208.
- [11] 李平.晚清女学兴起及内在矛盾性[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11):44-46.
- [12] 左芙蓉.缠足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研究述评[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8):23-28.
- [13] 史莉琴.梁启超的戒缠足思想与实践[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06):57-58.
- [14] 谈儒强.论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价值意蕴[J].南通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02):51-54.
- [15] [1]谈儒强.宜家善种作新民-梁启超女学观新探[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04):30-34.
- [16] 徐适端.俞正燮的人权意识及其妇女观评述[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6):140-144.
- [17] 张洪萍.试析谭嗣同的教育思想[J].阴山学刊,2005(06):72-75.
- [18] 李砂砂.严复教育思想述论[J].阴山学刊,2003(04):95-97.
- [19] 李永生.经元善的中国新式女子教育探索[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0(04):59-62.
- [20] 贾春.浅析梁启超兴办女学的思想主张[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7(04):30-32.
- [21] 马庚存.论中国近代产业女工的历史命运[J].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04):65-67+73.
- [22] 余丽芬.康同薇女子教育思想述评[J].浙江社会科学,1995(04):110-113.